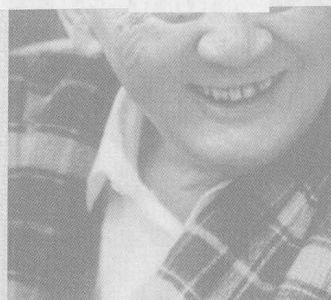


4 散文卷

叶至善集

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

开明出版社



4 散文卷

叶至善集

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

开明出版社

C52

366

V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至善集. 散文卷 / 叶至善著; 叶小沫, 叶永和编.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31-1668-8

I. ①叶… II. ①叶…②叶…③叶… III. ①叶至善 (1918~2006) —选集②散文
集—中国—当代 IV. ①C52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3161 号

叶至善集

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

出 版 人: 陈滨滨

责任编辑: 支 颖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 编: 100089

电 话: 88817647 (总编室) 88817489 (发行部)

网 址: www.kaimingpress.com

高教社 (天津)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 千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父亲的希望	
《公路行旅》书后	3
由一封旧信想到的往事	5
附：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	6
对《“圣陶”的来历》的更正	8
他的心从没有离开过教育事业	10
五卅运动中的《公理日报》	13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的诞生	20
“赋别寄哀思”	25
七十年前的日记	30
关于《景泰蓝的制作》	34
父亲是怎样教育我的	38
月下老人的系念	41
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	43
“六腊运动”	46
细数家珍	48
父亲的“顶真”	50
父亲的希望	52
编父亲的集子	56
教 育	58
疲 倦	62
为建立《叶圣陶纪念馆》的说明	64

父亲和基础教育	66
旧事重提	68
给罗店中学的一封信	70
他一直在关心着我们的国家	72
明年花胜今年朵	74
没有写下来的读后感	76
担 心	77
成功的喜悦	78
题《五醉图》	80
三则“叶老”的故事	82
怅 惘	84
海棠的缘分	86
父亲的“少作”	89
送父亲到用直	91
我的父亲叶圣陶	93
父亲和气功	105
《十三经索引》始末	107
改 诗	114
在叶圣陶研究会成立会上致辞	117
“更画半边儿”	118
鲁迅先生的三句话	120
谈父亲的《语文教育二十韵》	126
《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	132
一部手抄的《毛主席语录》	134
父亲跟至诚谈剧本创作	136
一大堆的遗憾	152
初读《俞平伯全集》	154
我学作文	158
父亲提的修改意见	161
儿时唱过的歌	166
广告中的明星像	168

我给父亲念《论语》	170
陪父亲喝酒	174
读我书	177

如水集

喜 雨	181
病中情味	183
微 雨	188
化为劫灰的字画	190
头发的故事	193
寄卖所	202
司机们	204
擦皮鞋的	206
成都盆地的溪沟	208
脚划船	211
谈写日记	213
旋 涡	215
史先生	218
某种人物	225
雅安山水人物	230
对镜子的三种态度	233
记《小梅花屋图》	234
读朱自清先生的一组怀旧诗所想起的	237
打不跑的人	244
为收信人着想	246
附：朱自清致朱光潜的信	248
罚站的叔叔	250
红杉的遭遇	251
博识家鲁迅先生	255
夏丏尊与白马湖	257
等	260

徐调孚先生的《记夏丏尊先生》	261
读了《倒影集》	265
夏丏尊先生谈读书	268
姚传芑之《寻梦》	270
谁都牵挂的那个小女孩	273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277
赞《蟋蟀》	280
怀念王峻岑先生	282
“丐”和“丐”	285
悼念方宗熙同志	287
冬至夜的祝福	290
叫我怎能不歌颂	291
一封谈绘画的信	292
胡愈之先生和开明书店	295
给爆竹安上药线	298
纪念夏丏尊先生	301
“期文化之交互”	305
非常难得的一本《平屋杂文》	308
鲁迅先生与连环画	311
梦中诗人	313
纪念章雪村先生	315
焚稿记	319
只求更好	321
重游富春江	322
意识波	325
章锡琛先生和开明书店	327
追悼会后的梦	330
新挂钟	332
怀念王伯祥先生	334
《我的外公》读后	340
在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祝辞	343

董纯才先生和开明书店	344
听琵琶两首	346
至诚终于先去了	348
祝郭人全先生九十寿辰	355
代采访者写的访问记	358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家明信片》	359
唱国歌	362
舒适的旧梦	364
令人羡慕的五十年	365
曾经有过这样一所小学	367
《爱的教育》七十年	369
大酒缸	372
集体创作	374
他日相呼	378
柑橘和竹子	380
家居北京五十年	382
戏赠周以谟兄	386
珠穆朗玛峰的正名	387
愿作鸳鸯不慕仙	391
喂 蚕	392
淡淡的童趣	395
纪念《中学生》七十年	397
俞平伯先生的明信片	399
梦见在立达的课堂里	400
题东山魁夷先生画册	402
我不赞成	403
编后记	404

父亲的希望

《公路行旅》书后

一九七八年六月，父亲和我去四川参观。在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上，常常望见一些河谷里有几座废弃的铁路桥墩。父亲告诉同去的青年工作人员说：这些桥墩是清朝末年留下來的。那时候，四川的士绅募集款子，要造一条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清朝政府下令把这条铁路收归国有，四川百姓反对，于是闹起事来，清朝政府调动湖北的驻军进川镇压。革命党人借此机会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这就是辛亥革命。不久，清朝政府被推翻了，川汉铁路的工程就此停顿下来，直到解放后才修成了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

父亲说，现在西南地区有了好几条铁路干线，已经初步形成了铁路网，旅行真是方便多了，也舒服多了。解放前只有公路，山高路险车坏，茫茫然不知道哪一天能到达目的地，也不知道这次出门能不能回来。说着说着，父亲提到了他在三十六年前写的《公路行旅》来。他把这首五律默写在一位青年同志的笔记本上，然后给他们逐句讲解。

自古难行路，今难倘有余。

临程谈黑市，过站上黄鱼。

蚁附颠危货，麋推老病车。

抛锚愁欲绝，浑不傍村墟。

诗的开头说：自古以来，旅行是件难事，“行路难”三个字常常在诗里出现，可是如今旅行的难处或许比古时候还多。要出门，首先是车票不好买。公路局的汽车不多，车票当然有限，而且被某些人垄断着，以高出票价若干的黑市价出售。有时候连黑市票也买不到，只好找司机

商量，付出的钱当然也得高于票价。这些司机私自让搭的无票乘客叫作“黄鱼”，他们得到离站一二公里的地点去上车，这是为了避过检查员。当检查员的哪里会不知道，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罢了，在这里头他们也不会没有好处。

后面四句说路上的情形。那时候几乎所有的货运卡车都搭客。卡车走在坎坷不平的山间公路上，上面的货包堆到一丈多高，颤巍巍地已经够叫人害怕的了，乘客还得像蚂蚁似的扒在那高高的颠簸的货包上。那些汽车大多年久失修，既老且病，遇到陡一点儿的坡就爬不上。这时候司机只要吆喝一声，乘客们就心甘情愿下车来，同心协力使劲推车，因为大家都怕汽车“抛锚”，尤其怕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地里“抛锚”。

这首五律是父亲在贵阳写的。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父亲动身去桂林跟朋友商量在内地成立开明书店编辑所的事。如果是现在，乘火车大概两天工夫就到了，父亲这一趟却走了三十三天。固然，沿途要探访一些分散在各地的老朋友是一个原因，可是时间主要花在候车和买票上，在贵阳就耽搁了十五天，于是就有了五月二十七日写下的这首诗。当时公路坏，汽车坏，司机又不负责，所以翻车是常有的事，乘客从车上摔下来也是常有的事。开明书店的同事沈振黄，一位很有才干的青年画家，就是在湘桂大撤退中摔死的。他把座位让给了一位孕妇，自己爬上了车顶。汽车拐了个急弯，把他摔在山沟里，一只挂在背包上的搪瓷碗嵌进了他的后脑勺。他牺牲已经三十六年了。

一九八〇年十月

由一封旧信想到的往事

俞平伯先生的这封信是在我父亲的旧日记本中检到的，写信的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距离朱自清先生逝世已经半个月了。信的开头说朱先生死于三误。怨及大夫，本是亲友的常情，俞先生在悲痛中自不能免。朱先生家累重，工作忙，抗战期间就患胃病，时常疼痛呕吐。胜利后，朱先生回到北平已在李、闻二位被刺之后，他参加民主运动，迎接解放，虽然贫病交加，却坚决地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的事；逝世前两日——八月十日，他手术后躺在病床上，还嘱咐家里人说：他已经签名拒绝美援，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

俞先生信上说的“朱、常二文”，指朱光潜先生和常风先生的悼念文章，那副挽联，俞先生隔了三十多年还记得，上联是“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下联是“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俞先生和朱先生都是北大毕业的，相识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一九二〇年秋季，他们二位都去那里教书。第二年初冬，我父亲被朱先生拉去。那时俞先生已离开学校，仍住在杭州。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三位的名字经常一同出现在书报杂志上。我国第一种新诗刊物《诗》月刊，就是他们和刘延陵先生一同在一九二二年创办的。一九二五年秋季，朱先生到清华大学任教，也是俞先生介绍的。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往事如流尘，一副挽联怎么说得尽呢？措辞真的难极了，只好说得空泛些。悲痛总得找个人倾诉，我父亲是深知俞先生和朱先生的，偏偏又远在上海。

俞先生最后提到了给朱先生编文集，提到了将要出版的闻先生的文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朱先生任整理闻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第二年一月，委员会就决定了《闻一多全集》的拟目，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马上开始编辑，并陆续把稿件送给开明书店，才一年半，工作就全部结束。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在闻先生遇难二周年纪念会上，朱先生报告了《闻一多全集》整理和出版的经过。可惜这部书晚了一个月出版，朱先生竟来不及看到。《朱自清全集》后来只拟了一个目录，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四卷本的《朱自清文集》。闻先生和朱先生的著作目前都不容易找到。听说《闻一多全集》即将重印。《朱自清文集》的整理和出版，似乎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一九八一年三月

附：

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

圣陶兄：

佩弦逝世仓卒，在医院病重，阅报始知之。弟同在一地，未能先图挽救，痛悔无已！此病一误于平素检查得不够精准；二误于开刀之迟缓，发病后十一小时；三误于大夫手术之不太高明。病深体弱原未堪久持，但此次症候似尚非致命者。今若此，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人事之未尽乃诿诸天命则谬矣，此弟所以引为长恨也。本想立刻给兄写信，但实在拿不起笔，而大概情形报上既已说过了。并附去《民国日报》一纸，朱、常二文尚不劣，弟之挽联极难措辞，说此则必漏彼，故只可如此，望兄评之。来索稿者纷纷，以情怀伊郁，记忆迷茫，实无法应付。然亦写了两文，一付《中建》北平版第四期，一付商务之《文学月刊》。迟日谅可次第尘览，仍请教之。弟与佩兄往事如尘，但此间乏可深谈之友，恨不得飞度南云，与兄共洒此泪耳。盖心知其意者，惟我兄一人而已。

昨日在清华开吊兼作追悼会，到者知名之士甚众，挽词多可观者，赙赠亦不薄。各处唁电均在一板上贴出，开明同人的电报弟已看见。其

家属以后经济状况尚不很成问题。朱夫人如在北平，清华方面答应给一职员位置。其全集闻开明允印，甚佳。编纂者，清校同人将弟名列入，自谊不容辞，但亦不知如何着手也。一多全集未出而佩今往矣，身后浮名何益逝者耶！聊各尽各心而已。弟近来非常沉默，而一般的气压又很低，将来真不知如何也。

盼抽暇来示略述所怀，以慰劳思！匆颂近安。

弟平伯頓首
八，廿七，午

对《“圣陶”的来历》的更正

《小学语文教师》今年第一期，有一篇《“圣陶”的来历》，所说的“来历”几乎全都错了。那篇文章是辑成的，所以错不在于辑成那篇文章的同志，而在于他所收集到的材料。我一点儿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只想把真正的“来历”说个明白。

先说“绍钧”。“绍钧”是我父亲的名，我姑母名“绍铭”，可见我的上一代是“绍”字辈。老兄妹俩的名或者是我祖父给取的，或者是我祖父请人代取的。从前的规矩，名是让父母老师等长辈叫的；对长辈说话得自己称名；对平辈说话要表示自谦，自己也称名。我父亲在写给朋友的信上都自称“绍钧”，或单用一个“钧”字。现在大多数人不知道那时的规矩了。有位青年教师写信给我父亲，特地称呼“绍钧先生”，他以为要这样才尊敬，其实错了。错了当然不要紧，现在不必讲究那一套了。但是有些“作家介绍”、“作家传略”的开头就是“叶圣陶，又名绍钧”，似乎不太好。“绍钧”是本名，并非“又名”，“圣陶”是号，不是名，而且是后取的。既然正经地介绍作者，总应该把名和号分辨清楚。

从前，一个人成长了，要交朋友了，要进入社会了，就得起一个号（当然限于男子）。在社会上交际都得用号来互相称呼，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起号一般用名作依据，要起在意义上有联系的，或者互相呼应，或者互相补充；这种联系还得从古书上去找。我父亲的第一个号“秉臣”，是根据《诗经·小雅》上的“秉国之均”那句话取的。这儿的“均”就是“钧”，“秉国之均”大概是掌握治理国家的枢纽的意思；所以接下去的两句就说能辅助君主，能教化百姓。这样的人的身份当然是

“臣”，“秉臣”这个号就是这样来的。取这个号的是我父亲的堂叔，他名朝缙，字绶卿，是一位教书先生。按那时的习惯，给我父亲取号可能在他十三岁进小学之前，他自己记不真了。

“圣陶”这个号在辛亥革命之前就用了，因而绝非是在苏州光复后的第二天取的。我父亲在阴历十六岁生日的第二天开始记日记，那一天是公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日记本的封面上就写着“圣陶日记”四个篆字。给我父亲取这个号的是一位姓沈的老师，他名修，字绶成，古书念得很多很熟，在中学教国文，教的不是我父亲那一班。我父亲看到许多同学请他取号，也请他取一个。他给我父亲取了“圣陶”，说出典是“圣人陶钧万物”，却没说这句话出在哪一本古书上。我查了《辞海》，原来“陶钧”就是制陶器的时候，用来把泥团旋成陶坯的那个转盘。在“圣人陶钧万物”这句话里，“陶钧”当然作动词用，大约是塑造的意思，陶冶的意思，感化的意思。其实名和号都不过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取的人固然有他的用意，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会受别人给取的名和号的影响，我是怀疑的。

我父亲早年发表文章，除了署笔名，大多署“叶绍钧”，也有署“秉臣”的。《隔膜》《稻草人》的早年版本也署名“叶绍钧”，也许自谦成了习惯，把读者当作长者，到三十年代初还是这样。跟我岳父合著的《文心》出版的时候，我岳父署名“夏丏尊”，因为大多数读者只知道夏先生自取的号；我父亲仍署名“叶绍钧”，可能出于他对夏先生的尊敬。陈望道、朱自清两位先生写的序中，又不能不称我父亲为“圣陶”，这就跟印在封面和扉页上的不一致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用名用号这个问题，常常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附带说一句，朱先生在序中提到的“小墨”是我的小名，不是号，我没取号。

至于那篇“来历”中说到的章先生，应该是我父亲在小学里的老师章伯寅先生，他没有给我父亲取过号。一九四四年，我父亲写过一篇小说《我们的骄傲》，章先生就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黄先生的原型。

一九八二年二月